人民论坛网 2017 年 6 月 23 日

2030，中国让世界更美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欧阳向英

2030 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来自各方的预测表明，203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作出这一结论的有世界银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以及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大预测》的作者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和胡鞍钢等人。对于未来，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谨慎务实的，从未接棒 G2，或谋求成为 G1。按照我们党“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规划，到 2030 年小康社会已全面建成，中国正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

2030 年值得期待。其原因，不在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霸权国家，那代表了一种旧模式和旧秩序。中国要做的是创新，既包括国家发展模式上的创新，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上的创新，以创新为驱动，让世界更美好。

一、国际不平等是 21 世纪的最大难题

近年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被很多人淡忘之际，法国一名年轻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以其新作《21 世纪资本论》异军突起，使国际不平等重新成为世界性话题。该书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 70 年代，贫富分化呈 U 型曲线，70 年代后有所加剧；21 世纪贫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资本带来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富人的手里；如果继续现在的趋势，21 世纪将和 19 世纪一样，出现巨大的贫富落差和尖锐的社会矛盾，红旗到处飘扬，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1]

劳尔·德尔戈多·怀斯则从全球劳动力变化的视角对国际不平等进行分析。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全球化、国家和地区内部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和剥削、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等问题，怀斯探讨了新全球结构对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水平的冲击及社会影响，得出劳动力被迫转移已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的结论，并提议组织社会运动，以对抗不利于工人阶级的那些因素。[2]

还有一些学者从世界经济结构的角度阐述国际不平等的原因。他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多以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来肯定全球价值链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意义，但回避甚至故意掩盖了由此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以“资本家的手”取代了“看不见的手”，指出正是在“资本家的手”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经由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转变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关系。全球化经济的建立和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因此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精心打造的经济霸权体系。只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本结构，用合理、公平的新体系代替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国际不平等的消除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从资本到劳动力再到世界经济结构，国际不平等问题需要从多维度加以分析，也需要从

[1]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

[2] 劳尔·德尔戈多·怀斯、王乙茹：《移民与劳工问题:帝国主义、不平等发展和劳动力被迫转移》，《国外理论动态》，2014 年第 4 期。

多角度给出解决方案。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边缘国家，关注整个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不应成为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捍卫者。当然，我们并不主张建设人人平等的空想世界，也不是要回到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甚至不认为国企的规模应出现较大的扩张，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正确，政府亟需强化其社会职能，遏制财富过度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同时对资本的全球化予以适当规模的控制。这是解决国际不平等的最佳方案。

二、我们要的是怎样的发展？

增长与发展是两个相关联却不完全等同的概念。在经济领域，增长通常表示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和均量的增加，而发展不仅包括数量的增加，也包括经济过程的整体进步。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也不等于发展。基于一切生产和社会活动都应服务于人类自身，而人类发展主要体现在人的各种能力的提高上，所以发展理应包含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

人类发展主要受到人口-资源-环境失衡的制约。现在，全球有 10 亿左右的人口生活极端贫困，每天平均收入不足 1.25 美元，还有 10 亿人口营养不良。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预测，到 2030 年，由于经济发展、个人收入提高，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将会下降约 50%，但如果全球经济出现长期萧条，到 2030 年，那么减贫 50%的目标就只能完成一半。到 2030 年，传染疾病造成的死亡预计将会减少 30%，而非传染性疾病导致死亡的人数将增多。由此可见，2030 年的世界并不必然是美好的，它的样子与我们现在的作为密切相关。放眼更长时段，到本世纪中叶，根据人口与社会学家的预测，全球人口可能超过 80 亿，主要增长来自亚非发展中国家，人类将面临传统疾病及其变异传播、不可再生能源枯竭、环境承载力濒于极限的威胁。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有赖于人类创造新的发展模式，从传统的以自然为征服对象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

传统工业化是人类环境问题的根源。以工业革命为先导，从18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开始，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和殖民的扩张，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逐步确立，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先发展,后治理”的过程, 在国内建立了以重工业体系为主导的国民经济结构，同时在国外勾勒“全球经济地图”，将非工业化国家变为资源供应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二战后，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传统发展观的局限性，但并没有停止工业化的脚步，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加速工业化，特别是将污染行业和低端产业向外输出，而新兴国家希望加快经济增长，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表示欢迎。[3]资源低效配置、环境严重破坏、人民幸福感不强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产生了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国际收支恶化、社会矛盾尖锐等一系列后果。由此可见，不从根本上扭转传统的发展思路，不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认识到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性，转而重视解决自然-社会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和内生性发展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内生性发展的外延由经济拓展到社会，内涵从单纯经济增长到注重改善经济结构、保护资源和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注重社会公平，给发展中国家一度带来繁荣，但由于它的思想基础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在历史进程中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局限性，“拉美陷阱”就是明显的例证。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鼓励从事对资源、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摒弃不利的经济活动，标志着我国开始重视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然而，所谓“不利于资源和环

[3] 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的几十年内，全球的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主要由七个污染行业（钢铁、炼油、食品、工业化学品、纸及纸制品、有色金属、水泥）构成，但污染的空间却发生了变化，污染行业从地球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主要方式是通过贸易（包括货物、服务、投资等贸易方式）直接或间接向它国转移。

境的经济活动”大多是基于贫困落后的社会现实开展起来的，骤然关停意味着亏损和失业，但不治理则意味着污染终将反噬人类自身。这时，在 GDP 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间找到动态平衡点，稳步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集中了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优秀成果，既是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良策，也是中国拉动世界经济的良方。“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目前，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科学统筹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使其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发展的新优势，是关系民族崛起和国家复兴的百年大计。中国需要创新发展理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生产方式、创新工艺流程、创新思想观念，在全民创新、全面创新的基础上引领经济发展。“协调”是各要素保持平衡。不仅要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也要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实现经济-社会综合平衡发展。“绿色”强调将环境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成本考虑。不以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来换取经济增长，努力使经济活动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流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面对世界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应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参与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塑造。“共享”是社会发展的内容。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不仅要让本国的老百姓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切实提高普通居民的生活-生命质量，而且通过“一带一路”等顶层设计，与周边国家实现经济联动与成果共享。“一带一路”沿线有些国家或担心中国输出落后的产业，或担心中国掠夺资源并将自己变为附庸国，其实是不理解“一带一路”和中国发展阶段的关系所致。当初中国引进外国投资来改善就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却忽视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如今绝不会将此模式照搬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就算个别企业想要照搬也行不通。随着时代的变迁，各国普遍重视清洁产业的发展，污染企业会为环境破坏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传统行业并非除了环境污染就一无是处，钢铁、煤炭、水泥、光伏、纺织、船舶制造等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不可或缺，只是需要从粗放转变到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轨道上来。

五大发展理念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指导思想，也吸纳了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世界发展模式是个贡献。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任何国家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到其他国家的发展，不能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说，必须要做到全面协调，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需求，也要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发展，做到统筹兼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发展模式必将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到那时，中国的发展观对各国探索更科学、更文明的发展道路，对人类探索一般社会发展规律，乃至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必将做出更大贡献，从而彰显出更重大、更深远的世界影响。

三、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创新

资源与环境问题涉及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又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密切的联系。现存的国际秩序大多是在“二战”后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发展中国家在脱离西方殖民体系取得独立后，旧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和经济结构并未相应改变，这种状况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条件，制约着发展中国家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努力。国际社会要谋求人类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设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使发展中国家尽量摆脱对环境资源的依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已成为自由经济与开放经济的一面旗帜。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都有“反全球化”的声音，认为全球化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也使国内收入分化和失业更加严重。客观地讲，全球化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重要的是如何放大它的正面效应同时减少负面效应。这取决于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也取决于全球治理能力的加强，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推动。中国应认真思考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和定位，以高超的定力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目前，世界范围内金融霸权主义仍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本来就非中性的国际制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继续向既得利益者倾斜。特朗普上台和欧洲民粹主义风行，决定了西方对中国的打压政策不会停止，大国博弈会更加激烈，议价机制会更加复杂。中国有必要重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念，首先立足国内，解决好自身问题，然后才是以适当的规模和速度进行对外经济关系的深化与拓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经济上依靠自力更生，某种程度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政策。改革开放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由捍卫主权逐渐过渡到积极建立对外经济联系，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党的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入到新阶段。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等顶层设计前所未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我们的经济管理能力和外交水平提出了新挑战。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公平包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以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分配不均的难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世界各国对全球化认识尚有分歧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认识到，国际化、一体化和全球化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三个层次。全球化只是中国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的手段，并非目的，不应为全球化而全球化，也不应对全球化不加任何限制。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上的根本差异。中国与世界的政治交往有和谐，也有斗争，维持同一性的关键在于坚持国际民主原则。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4]国际民主是我们的呼声，但苦于孤掌难鸣，所以中国要在国际上搞统一战线，搞亚非拉联合。第三世界的兴起及其国际分量的大大增加，是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现实基础。“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5]观察近期发生的中东动乱和欧洲难民危机，愈加有必要重申国际民主对国际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民主原则扩展到国际范围后，理应遵循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上拥有同等的话语权，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空想。国际组织和各种国际论坛中充斥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号称最民主的西方国家拒斥在国际事务中实行民主原则，却以不民主的名义干涉不同制度和不同文明的国家内政，充分说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仍占主导地位。

---

[4]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9-170 页。

[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9-360 页。

现在是 2017 年，距离 2030 年不过短短的 13 年。这 13 年，可以预料的是，中国经济会持续增长，社会会不断进步，国际话语权也会日益增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借助于高新技术垄断和国际体系把持，西方国家不会迅速衰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方推动权力扩散，一方努力捍卫霸权，博弈和斗争在所难免。融入世界体系的同时肩负改造国际秩序的使命，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都是考验。中国需要团结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寻求共同利益，付诸一致行动，齐心协力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创新。只有那时，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